

目录

总主编的话	i
前言	vii
第一章 概说	1
<hr/>	
1.1 译者行为批评应用研究的定性	1
1.2 理论和研究的称谓	3
1.3 理论与研究的关系	4
1.4 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特质	5
1.5 研究的路径	6
1.6 “译者行为研究”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分析）” 的关系	7
1.7 研究的视域和视角	8
1.8 研究和理论建设的推进	10
1.9 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关系	10
1.10 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的关系	11
1.11 动态研究和行为研究的关系	12
1.12 基础理论概念和译者行为原则	14
1.13 学科包容关系	16
1.14 理论和研究的表述问题	17
1.15 研究的守正和创新	18
1.16 翻译理论中国学派的发展问题	19

第二章 研究基础与研究背景 21

- 2.1 为什么要开展译者行为研究? 21
 - 2.1.1 开展译者行为研究的缘由 21
 - 2.1.2 与翻译社会研究的关系 27
 - 2.1.3 与翻译理论中国学派的关系 29
- 2.2 译者行为批评与国外译学话语对比 33
 - 2.2.1 引言 33
 - 2.2.2 西方“译者行为”论述：内容梳理 34
 - 2.2.3 “译者行为批评”与西方“译者行为”：
对比阐释 42
 - 2.2.4 结束语 53
- 2.3 译者行为研究的创新性 55
 - 2.3.1 译者行为研究创新发展概说 55
 - 2.3.2 创新基础 57
 - 2.3.3 创新路径 58
 - 2.3.4 创新空间 60
 - 2.3.5 结束语 62

第三章 理论系统与概念内涵 63

- 3.1 译者行为理论源流 63
 - 3.1.1 引言 63
 - 3.1.2 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源流 65
 - 3.1.3 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归因 70
 - 3.1.4 结束语 77
- 3.2 译者行为研究的理论属性和理论应用 78
 - 3.2.1 译者行为研究的理论属性 78
 - 3.2.2 译者行为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81

3.3	译者行为批评概念内涵对比	89
3.3.1	基础理论概念辨析	89
3.3.2	“忠实”与“翻译”和“翻译活动”	97
第四章	研究操作性与范例	103
4.1	研究的操作性问题	103
4.1.1	分析层次化	103
4.1.2	概念细密化	107
4.1.3	核心指标量化	110
4.1.4	“人本”路径的译者行为研究课题设计	116
4.2	译者选择性行为考察——以《边城》英译为例	118
4.2.1	引言	118
4.2.2	译者选择性行为	123
4.2.3	译者角色与身份的理性表征	129
4.2.4	乡土语言翻译的理性	135
4.2.5	结束语	139
4.3	译者群体行为研究个案：唐人送别诗译者群体行为 批评分析	140
4.3.1	引言	140
4.3.2	翻译外	143
4.3.3	翻译内	149
4.3.4	译者群体行为	155
4.3.5	结束语	157
第五章	批评范式与范例	159
5.1	译者行为批评模型	159
5.1.1	标准、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	159

5.1.2	关于翻译标准主观性与“忠实”标准的讨论···	162
5.1.3	翻译批评的客观化与译者行为批评模型的 尝试·····	166
5.1.4	文本类型与“文化—文学”连续统批评分析例示 ·····	171
5.1.5	结束语·····	176
5.2	译者行为批评“行为—社会视域”评价系统·····	178
5.2.1	译者行为批评“行为—社会视域”评价系统构建 动因·····	178
5.2.2	“译者中心”译者行为评价系统解读·····	182
5.2.3	“社会中心”译者行为评价系统构建的学理性··	185
5.2.4	译者行为批评双中心评价系统的平衡性·····	188
5.2.5	基于时代需求的“译出”译者行为批评双中心 评价个案·····	191
5.2.6	结束语·····	194
5.3	译者行为的多维批评·····	195
5.3.1	引言·····	195
5.3.2	译内与译外之间·····	197
5.3.3	鉴者与赏者之间·····	199
5.3.4	自译与自评之间·····	202
5.3.5	缺席与在场之间·····	204
5.3.6	译者与作者之间·····	208
5.3.7	结束语·····	212
第六章	译者行为应用研究	214
6.1	杨苡《呼啸山庄》译者行为应用研究·····	214
6.1.1	《呼啸山庄》杨译本及其研究·····	214
6.1.2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适用性·····	216

6.1.3	《呼啸山庄》译者杨苡文本内的行为特征	217
6.1.4	《呼啸山庄》译者杨苡文本外因素的互动	223
6.1.5	翻译方法的选择	227
6.1.6	结束语	230
6.2	译者行为理论与翻译实践	231
6.2.1	引言	231
6.2.2	“求真”“务实”与翻译之道	232
6.3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机器翻译本质问题反思	236
6.3.1	引言	236
6.3.2	翻译主体：人译者与机译者的区别性语义特征	238
6.3.3	翻译产品：基于文本类型划分和目标导向下的翻译批评	242
6.3.4	翻译过程：译者角色化	245
6.3.5	结束语	248
第七章 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		250
7.1	译者行为研究发展和影响	250
7.1.1	国内外三大阵列译者行为研究	250
7.1.2	译者行为研究在中国的阶段性进展	253
7.1.3	译者行为研究的社会接受	254
7.1.4	译者行为理论的国际传播路径	257
7.2	译者行为评价机制的体系化统筹和理论话语建构	261
7.2.1	引言	261
7.2.2	行为批评观范式：译者行为评价系统的多维性阐释	263
7.2.3	再论译者行为研究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和应用性	268

7.2.4	结束语	273
7.3	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三位一体发展路线图	274
7.3.1	译者行为理论系统建设概览	274
7.3.2	译者行为理论一体化逻辑系统	277
7.3.3	译者行为理论一体化应用系统	280
7.3.4	译者行为理论三位一体评价系统	284
7.3.5	从“译者行为批评”到“译者行为研究”	288
	参考文献	293
	后记	323

为方便读者阅读，及早理解并掌握相关基本问题，本章将以概述的形式呈现如下。

1.1 译者行为批评应用研究的定性

简单地讲，“译者行为批评应用研究”即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指导下的译者行为研究。

本书呈现的译者行为研究是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以译者行为为研究基点和研究对象的外化、动态、人本属性的“译者研究”“（翻译）批评研究”和“行为（过程）研究”，目前以批评研究最为成熟。不管是译者研究、批评研究还是行为研究，均聚焦以人为本的互动关系研究，集中围绕“外化性”“人本性”“动态性”三大关键词展开。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一直处于平稳向上的发展态势，这与翻译活动中译者行为无处不在的事实和译者行为研究“立足学术，对接社会”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译者行为批评”是理论本身，但概称为“译者行为理论”，是为了给未来可能的其他译者行为理论留下空间；“译者行为研究”是研究对象本身，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之名分开对待是为了给其

他理论指导下的译者行为研究留下空间；“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与“译者行为研究”有稍许不同，前者带有翻译批评的目标，而后者在经过对事实的研究后可归入翻译史研究、翻译策略研究等，当然也可以归入翻译批评研究，只是不像前者预先设定翻译批评的目标。

批评研究是本理论的首要目标，而目前阶段所说的“译者行为研究”，主要默认为“批评研究”（也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分析]”相称），所以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最多、最成熟，发展最迅猛。理论建设“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视域是“文本—语言视域”“行为—文本视域”和“行为—社会视域”三大视域的简略形式。既然称为“视域”（相对于“视角”），就必然包含广泛多元的视角和建设内容。传统上的翻译研究虽然不都是直接以翻译批评为目标，但因为被称为研究，而研究总体上呈现为批评性质，所以也会在“批评研究”的视域中得到体现。

本成果多次提及三位一体的“文本—行为—社会”实际由三层构成：

- (1) 宏观上，它是译者行为理论的发展系统和“批评研究”的评价系统。
- (2) 中观上，它是理论框架和分析框架。
- (3) 微观上，它是分析方法和评价模式。

“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评价系统萌芽于行为观最初提出之时，详细阐述见于周领顺《翻译批评第三季——兼及我的译者行为批评思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行为观的意义在于在翻译内外以及文本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所以周领顺在上述文章中将“翻译内”称为“文本批评视域”，将“翻译外”称为“文化批评视域”，而将“行为批评视域”看作“翻译内外”的视域即为此意。如今为了更好地实现翻译批评全面、客观和科学的

目标，有必要在“行为”的统领下将“文本”和“社会”这一链条上的两个端点连接起来，形成“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评价系统。立体地看，“行为”“文本”“社会”呈现出一个三角关系，“行为”在上层，“文本”和“社会”是左右两个基点。¹

1.2 理论和研究的称谓

“译者行为研究”领域的开拓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构建，发生于传统上的翻译学研究阶段和“文化转向”后的社会学研究阶段相交的转型期，其“人本”研究特征符合国际译学的大趋势，是译学研究中理性、自然的转向，是对于“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Lefevere 1992: 14）的具体解读，是对后文本中心研究时期翻译活动复杂性的充分正视，所以既“前沿”，又“可持续”。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经过十几年的反复试用和不断完善，已经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认可。

出于对系统的思考，2023年7月，许钧先生在来电中提议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称为“译者行为学”。笔者理解许老师的良苦用心，这是许老师对理论的肯定和对未来的期许，毕竟“理论在‘学’之前”（朱含汐、许钧 2024:37）。笔者诚惶诚恐，实源于笔者对于“学”的敬畏，20世纪90年代有关“翻译学”能否成为“学”的争论笔者至今记忆犹新，在笔者看来，能称为“学”的，一定是达到了高度

1 有关该系统的介绍见于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行为—社会视域”评价系统》（《上海翻译》2022年第5期）、《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中国翻译》2023年第1期）、《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答研究者（之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答研究者（之三）》（《外国语文》2024年第1期）。

的抽象，发现了底层的规律，实实在在地成了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学问。方梦之（2024：133）从学术上讨论了“对‘学’的认识”。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虽然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初有成效，但仍然在摸索中前行，仍需谨小慎微。“学”将是我努力的目标，故本书仍采用传统的“译者行为批评”称谓。

1.3 理论与研究的关系

作为理论的“译者行为批评”是翻译批评理论的一种，而“译者行为批评”变为述宾结构后是“批评译者行为”，说明“译者行为”是批评的对象、研究的对象，也是研究的领域，揭示出理论和应用研究以及批评实践的密切联系。比如王峰等学者《基于语料库的译者行为批评：〈西游记〉蓝诗玲译本中的谚语》（2024）一文的题目中有“译者行为批评”字样，但并不是作为理论的名称使用的，而是“批评译者行为”名词性结构的表达，与述宾结构表达的含义一脉相承，所以其英语题目把“译者行为批评”翻译为 Critique of Translator's Behavior，而不是文章中真正作为理论名称出现的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本书不是纯粹的理论建构，而是把译者行为研究作为构建理论大厦的基点，检验理论应用效果，特别是以社会为中心的转型发展和三位一体理论建设的效果，以丰富理论、完善理论、提高理论对于应用研究的指导和对于翻译批评实践的指导，甚至间接对于翻译实践的指导，总体偏于应用研究。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和译者行为研究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着重讨论理论时，以“译者行为批评”相称，或概称为“译者行为理论”；

着重讨论研究时，以“译者行为研究”或“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相称。

“译者行为批评”和“译者行为研究”是理论工具和研究领域的关系，但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容的关系，鉴于译者行为批评是目前默认的唯一译者行为理论，所以也将“译者行为批评”概称为“译者行为理论”。

1.4 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特质

目前，译者行为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是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指导下实施的。

译者行为研究狭义上指的是一个专门的领域，研究的内容焦点在“译者行为批评”这一理论工具的字面上得到了暗示，其中的“译者”可扩展为“译者研究”，“行为”可扩展为“行为研究”，“批评”可扩展为“批评研究”。对于“译者研究”，学者可以进行体系化理论构建；对于“行为研究”，可以通过认知手段和科学仪器进行有关译者行为过程的研究；对于“批评研究”，可以开展行为批评体系化理论建设和操作性研究，不断加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联。相关的其他研究更多，如翻译社会学研究、应用翻译研究、服务地方的文化翻译传播研究、翻译理论中国学派研究和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研究，而各种交叉研究更是难以穷尽。

在“译者行为批评”名下预设的三大直接研究方向中，“译者研究”是基础，“行为研究”是过程，“翻译批评”既是研究的目标，也是一个研究的领域。“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用作手段（工具）时即评价模式，用作分析框架时即具体的理论框架，用作分析问题、解释现象的方法时即分析方法，统一归为译者行为理论一体

化评价系统的要件。译者行为批评中有关翻译内外的划分、超务实、社会化、角色化、翻译活动、客观环境因素等内容，说明了广义译者行为研究的存在，因为它们超出了译者的身份和行为。将广义研究和狭义研究相结合，是以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为前提的：比如，既要讨论狭义上“求真一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能够评价的务实行为倾向，也要讨论超越该评价模式评价的广义上的“超务实”行为倾向。这与翻译课堂上既讨论狭义上的翻译问题，也讨论广义上翻译活动中的一切问题一样，虽然狭义上的研究才是译者研究、翻译研究，但与广义上的研究相结合，才是正视翻译活动（包括译者及其行为）复杂性的应有作为。

1.5 研究的路径

译者行为研究具体有“译内与译外相结合”“文本与人本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等三大研究路径，但总体以“译者行为研究”或“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分析）”为研究总路径，凸显其“以人为本”的特质。它就像处在一个连续统上，起码指向研究上的五种研究范式，除了纯粹的理论演绎和借用外，还包括纵向发展研究（通过归纳、细化达到自我升华）、横向对比研究（比如对比国外同类研究，发现差异，服务主体）和交叉应用研究（如服务社会、对接时代）。

目前的译者行为研究主体是内部系统研究，也即主要说明文本和行为的关系，将来还要进行外部系统的研究，也即行为和社会的关系研究。行为和社会的关系，既包括译者作为社会人直接与社会发生的关系，也包括行为的结果（译文）和社会发生的关系，涉及

人的社会性与社会化，主观目的与环境性因素的互动，译文的生产、改造、出版、传播、宣传、接受效果和人群等整个参与链条的互动，更微观的还有审美、性别、时代等涉及翻译发生与社会大环境的一切因素的体系化和规律抽绎的研究。总之，研究整个动态的互动关系网络，才是真正的动态研究，也才可能产生最有意义的发现。

1.6 “译者行为研究”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分析)”的关系

当我们称“译者行为批评研究”时，是把它作为翻译批评的一部分看待的，具体以三大路径（译内与译外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文本与人本相结合）为方法，以三大目标（全面性、客观性、科学性）为旨归，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工具；称“译者行为研究”时，是将其作为一个领域看待的，不局限于翻译批评（比如可归属译者研究），也不局限于译者行为批评指导下的研究（比如社会学研究），旨在为其他理论视域的有关研究留下开拓的空间。同样，若把“译者行为批评”泛称为“译者行为理论”，则是出于增加理论维度的考虑。“译者行为批评”只有一个，但理论上讲，“译者行为理论”可以有无数个。至于称呼，既可以很具体，也可以大而化之，毫不矛盾。有意淡化译者行为研究的个人色彩，不一家独大，这是科学研究应有的态度。

至于“译者行为研究”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我们需要弄清楚“概念”和“术语”的不同。称谓不同，作用也不同。概念可以用作分析问题的工具和看问题的视角，但笔者没有把“译者行为研究”限定为概念，是因为带上“研究”后构成了一个领域，难以履

行理论工具的职责，笔者将“译者行为”概念化，是为了满足分析的需要。“译者行为研究”有自己的边界，作为术语（名称），是能够准确指称这个领域的。

大体上讲，加上“批评”字眼，就多了批评的目标，即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译者行为研究”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分析）”都含有“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方法内涵。目前，研究者未对二者作严格的区分，两种称谓共现，称“译者行为研究”的如李正栓、张丹的《许渊冲译者行为研究》（2022），滕梅、杨君宜的《国内自译群体译者行为研究》（2023）；称“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分析）”的如康宁的《中央文献先例叙事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以〈习近平讲故事〉俄译为例》（2022），林宗豪、王宏的《〈天工开物〉三英译本作者“误见”之译者行为批评研究》（2022），周领顺、高晨的《葛译乡土语言比喻修辞译者行为批评分析》（2021），周领顺、孙如莹的《唐人送别诗译者群体行为批评分析》（2023）等。

1.7 研究的视域和视角

“视域”宽广，里面包含了多个可以拓展的视角。以“译者”而论，在“文本—语言视域”，传统的观点将译者视为纯语言人，讲究的是语言差异、语言对比、句子结构的复杂度、句法、词彩等静态内容，译者是隐形的；当出现“文化转向”后，传统的做法显然解释不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所以需要“以人为本”介入对“译者行为”的考虑，这样才有了第二个视域出现的必要。在“行为—文本视域”，译者除了语言人，也是部分的社会人，因为他/她有社会性的一面，所以非本质上偏离原文意义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本质上偏

离原文意义的，所以需要第三个视域的出现。在“行为—社会视域”，译者扩展为“意志体”，那么，原本在第二个视域的“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就有了解释各意志体行为的作用了，拓展的空间越来越大，指向一切与意志相关的研究，走向全面而有针对性的结合研究，比如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旅游管理方与译者的互动研究、利益方与译者的冲突研究、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研究、翻译能力研究等。意志体包括译者（人）背后的国家、机构、经营方、利益方等的意志。这方面就有很多研究的内容。

虽然第一个视域因其是传统上翻译批评的主流做法而被摒弃，但是，摒弃它是因为它作为单一的评价模式时解释不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但并非说它没有用武之地。既然译者行为批评是为了实现翻译批评的三大目标而建设的，那么，第一个视域也就构成了该评价视域下的重要一环。不是要与传统割裂，而是要更科学地利用。至于是“视域”还是“视角”的问题，就看怎样使用了。

在“文本—语言视域”“行为—文本视域”和“行为—社会视域”三大视域的三位一体发展中，前二者重在“行为—文本视域”的理论建设、应用研究和批评实践，后者转向了“行为—社会视域”的理论建设、应用研究和批评实践，避免了传统模式在解释现象和解决问题时的乏力之处，向着翻译批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总目标更近了一步。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的宗旨是“立足学术，对接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可持续的。

三大视域浓缩为“文本—行为—社会”，而“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又可用作研究时的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和具体进行翻译批评时的评价模式，可用来分析问题、解释现象并指导翻译批评实践甚至是翻译实践。

1.8 研究和理论建设的推进

2019年以来研究和理论的深化发展具体是由连续四届的译者行为研究论坛（2019年北京、2021年曲阜、2022年重庆、2024年日照）和两次服务地方文化翻译和传播的译者行为研究论坛（“齐鲁文化‘走出去’与译者行为研究论坛”，2023年济南；“全国长江文化翻译与传播译者行为研究研讨会”，2023年扬州）大力推动的。如果进一步将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分为传统期和现代期的话，那么2022年以前的研究属于前者，2022年以后的研究属于后者，在学术上的标志是“行为—社会视域”的理论建设（周领顺 2022a, 2022d, 2022e）和随后的三位一体全面发展（周领顺 2023a, 2023e, 2024b, 2024c）。

1.9 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关系

内部和外部是视野问题，笔者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的开篇称其为“分野”。内部研究可以简称“译内”，主要指的是语码转换和意义再现方式上的，或者说是与翻译本身相关的，是翻译之“译”，直接面对的是读者，比如为提高译内务实效果而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外部研究可以简称“译外”，主要指的是语言外的、社会上的，是翻译之“用”，直接面对的是社会，比如翻译对社会的影响和社会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如翻译对于改造社会的影响和社会人群因喜欢“洋气”或“土气”而影响翻译采取异化或归化策略等）。当然，“译内”和“译外”都是以翻译为中心的，与翻译的关系是直接的。若以社会为中心，则是另外一番情形，比如为提高销售效果而

降低译书成本和定价，寻找声誉好的出版机构出版，采取有效的方式推广宣传等，与翻译的关系是间接的。以内外视野分析问题，能解决很多说不清或大而化之的问题，比如“省译”就要分出译内省译和译外省译。内外视野不是“二元对立”，二元对立的实质是非黑即白，因为极端化而导致片面化。视野的分化是分析方法的层次化，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全面、客观和科学。

1.10 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的关系

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是路径方法问题。传统上以静态研究为主，多以文本研究等静态内容为主要特征，即使是有关人的“译者研究”，也主要研究人的思想、成绩、策略、生平各自独立的内容。而动态研究的核心是彼此间的关系，比如动态地研究一颗星体，就需要研究它在轨道中与各元素（其他星体、相对速度等）的关系。在翻译上，动态研究呈现为研究各种元素在“语境”“活动”“过程”或“社会”中的关系，从彼此间互动的关系有望发现真实的意义。

本来，研究翻译就是研究意义的。至于意义是什么，则是个大话题，不仅仅是我们平时说的“意思”，因为“意思”只限于交际上的。奈达（N. Nida）当初给“翻译”下定义时用的是 meaning，也是不够学术的，所以他后来改用了 message。意义分多种，要想弄清楚真实的意义，就要动态地看问题，当增添人这一动态维度时，显然能把问题说得透彻一些。比如传统上对于“翻译腔”的讨论多是批判，那么译者为什么要使用翻译腔呢？再比如方言翻译研究，传统上只说翻译方法上的“对接”与否，但使用者为什么要用方言讲话呢？这就需要从人的维度看问题。不研究人的能力等客观因素和

主观上的目的因素，就难以看到问题的本质。译者翻译电影片名时，有的片名严重偏离了原文，在实际的活动（包括心理活动）中，译者已经反复揣摩了译文将和社会发生的关系（如票房收入），所以在翻译的初期就已了然于心，这不是仅靠总结静态的翻译方法就能说清楚的。再上升一个层次会发现，涉及利益的商业翻译大多数可能都会偏离原文，因为要务实于市场并进而务实于社会；很多展现个人文笔才华的文学翻译，也几乎都会偏离原文，夹杂进译者个人的创作欲望和个人的风格，所以就有了许渊冲的“超越原文”“和原文竞赛”（许渊冲 2000），也有了钱锺书一边批评林纾一边自己也在进行“二度创作”的事实（周领顺 2021c: 8），如果仅限于翻译策略的“好不好”和方法的“对不对”而不聚焦于人来研究，很多翻译实践谁也无法说清楚，这实际是从翻译活动演绎出了人学现象。这一切都是译者作为社会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她的行为是社会化的，与翻译的整个社会化相关，在原文意义的影子里关照读者、市场乃至整个社会，是译者社会性的张扬。

1.11 动态研究和行为研究的关系

“行为研究”就是“译者行为研究”中的动态研究，比如研究译者的意志、身份、角色化、行为、译文和社会等等之间的互动关系。一般说来，有意志就有行为，但行为并不都是意志的反映，更不仅仅是译者意志的反映。这些元素之间的互动会得到很多翻译事实的印证，因此也就会有很多研究的课题可做。

“译者行为研究”中的“译者行为”是研究内容，而“行为研究”也潜藏着以人为本研究的方法论。与“非行为研究”的不同在

于，行为研究是有关人（以译者为中心，涉及作者、讲话者、读者、消费者甚至赞助人等意志体）的研究，是动态研究，涉及上述各类主体的互动，而非行为研究只关注语言的静态层面，比如翻译技巧、翻译单位等。就翻译技巧而言，静态的非行为研究可以总结出直译、意译、合并法等方法，但行为研究则需要解释为什么译者在可以直译的情况下却要意译或者采用其他译法，涉及译者的目的性行为和环

境性因素的影响。

“非行为研究”是在文本研究的视域内看待译文和原文关系的。注意，这里的“关系”不是动态研究所说的互动关系，而是像杨绛讲的译文与原文的距离“愈小愈妥”这种关系（周领顺 2014a: 30），它主要发生于翻译研究历史上的传统期；“译者行为”则是在语境研究的视域内看待涉及译者各元素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主要发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文化转向”之后。从这一角度上讲，虽然“文化转向”不是理论，但功莫大焉，它改变或更新了研究的视野、路径、思维和范式。

语境研究包括对于社会环境等在内的一切外部环境因素的研究，对上述各因素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和上述各因素之间既不是平行关系，也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相包容且互动的关系。传统上比较一个原文的几种译文时，解读出来的多以对错论，而从人的角度切入讨论时，就要复杂得多，因为人是复杂的。虽然还存在对和错，但明知故犯或许是翻译执行者（译者）的主观努力。行为上的译者并不鲜见，只是在研究传统上被忽视了。从这点来看，译者行为研究对于研究范式的变革是革命性的。

译者行为研究中的社会性和社会化、意志和行为、行为和译文、译文和社会、行为和社会等各元素的互动关系研究，呈现为一个动态的网络。但很多时候，我们一边批判研究上、评价上的“双轨制”，

一边已经不知不觉地如此执行了，比如对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探讨。

在生活中，我们问静态问题时，期待的却是动态答案。比如大人常问的“树上有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几只？”，作为静态答案，“九只”肯定不错，不管其他小鸟飞到哪里十减一永远是九，但大人给出的却是考虑了枪声、树等环境因素的动态答案：“枪一响小鸟都飞跑了”，所以就会有笑料迸出。有时我们问动态问题时，期待的却是静态答案，比如苏小妹写的“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腮边”，可能需要考虑太阳、风等因素的影响，结果只有苏轼“脸长”的静态答案是预期的。静态研究、动态研究和作品里创造的静态之景（静景）、动态之景（动景）并不一样。比如，“红杏枝头春意闹”是动景，但如果对“闹”的词性、形式、种类、程度等方面进行各自独立的研究，却是静态研究；“鸟鸣山更幽”是静景，但如果对“鸟鸣”“山”和环境等元素之间作互动关系研究，却是动态研究。以上说的是研究方法，不是创作问题。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研究，既包括静态各个板块的独立研究，也包括各元素的动态关系研究，比如怎样的个性影响了怎样的意志，怎样的意志采取了怎样的策略，怎样的策略导致了怎样的行为，怎样的行为产生了怎样的结果，怎样的结果影响了怎样的读者、市场乃至社会，之后又怎样反作用于译者的“求真”“务实”努力及其相应的身份变化和角色变化等。

1.12 基础理论概念和译者行为原则

关于理论概念的解释，因各理论的视角不同，使用范围不尽一致。如果我们在译者行为理论的系统内解释，不必生硬套用其他理论中的术语进行对等转换。比如，如果认为“直译”（直接求真）

就是全部的“求真”，可能就有偏颇，因为“意译”也是向原文意义“求真”的一种做法（曲线求真），只是“意译”兼有提高可读性、迎合读者的一面，所以更多带有译者“务实”的行为倾向与相应的效果（只能直译且有证据显示译者“务实”的行为倾向与相应效果的除外）。而“异化”和“归化”都属于“务实”，因为不管是拉近和原文的距离还是拉近和读者的距离，也不管是为了输出文化还是方便交际，甚至也不管是为了“洋气”还是“土气”，最终都要体现于市场。至于哪种做法能够提高市场份额，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比如时代、人群、价格、译者和出版机构的社会知名度、宣传渠道等。而当把“直译”和“意译”作比较时又可以说直译为“求真”，而意译为“务实”。因为前者是在努力靠近原文的形式，后者是在努力讨好读者。

“翻译行为”和“译者行为”针对不同的范畴。“翻译行为”针对翻译范畴，涉及语码转换和意义再现；“译者行为”针对译者范畴，涉及“身份”等对于翻译过程的干预和翻译活动的影响。在社会视域看问题时，译者范畴进一步扩展为以译者为代表的所有意志体的范畴，诸多意志体和翻译过程中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翻译活动。

译者行为批评中“务实高于求真”“务实为用”“务实为上”的基本原则是把翻译看成社会活动。此时，忠实于原文的意义只是翻译的基本条件，而实现翻译活动的功能才是最高目标，只有与目标一致，才是最大的务实。例如，把“战国时期”翻译为 Warring States period，忠实于原文，意义完全正确，但其功能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这是因为，当翻译作为社会活动进入异域社会时，异域读者并无该时期的时间概念，此时，需要添加括号标出该时期的起止时间，才算实现了翻译的功能，达到了译者和翻译预期的目的。

这种做法也是常规的“增词不增意”的翻版表述，但传统上的“增词不增意”仍然是技巧层面的讨论和文本中心的思想，是“忠实”的另外一种表述。真正把翻译作为社会活动看待时，为了实现译文的功能和译者预期的目标，作为社会人的译者，将会把各种能达成目标的方法如零翻译、厚翻译（本书也作厚译）、删减、叛逆、创造等运用得游刃有余。

1.13 学科包容关系

译者行为理论（译者行为批评）指导译者行为研究，而译者行为研究是翻译研究中的基础研究，既直接服务于“译者行为批评”所指向的“译者研究”“行为研究”和“批评研究”，也间接服务于相关的“翻译社会学”“翻译应用研究”等研究领域。译者行为研究可以看作这些研究的一部分，比如王亚、文军（2023）就将“译者行为研究”包含在“译者研究”中。周领顺的《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2023a）一文重点指向服务于“翻译社会学”的建设，源于译者行为研究整体上是在社会背景下看问题的，所以最初指向联系比较紧密且在构想中的“翻译社会学”是理所应当的。但“翻译社会学”只是译者行为研究服务的目标，至于“翻译社会学”的理论系统是不是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并不会影响译者行为研究自身独立的系统理论建设。但涉及的这些相关研究领域均缺乏自身清晰的边界和概念系统，暂不具备自己独立的个性特征，整体尚处于构想和建设之中。所以，一旦“译者行为批评”直接指向的“译者研究”“行为研究”和“批评研究”领域的理论建设逐步做强、做大，最终是否会建设成包容性更强的上位学科研究领域也未可知。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执行者，其行为无处不在，而“人是多元的、矛盾的、非学科性的、边缘模糊的”（乔·莫兰 2023），也注定它拥有无穷的研究内容。

1.14 理论和研究的表述问题

张威（2023：67）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称为“译者行为批评观念”，这可能不够妥当，因为“观念”只可能是体系化“理论”的“前理论”。该文引言部分间接陈述的许钧和穆雷所说的“翻译研究成熟或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产出有广泛影响力的翻译理论、观念、标准和程序，进而形成体系完整、创作规范、评价客观的研究范式，不仅催生本土化的翻译流派或学派，也利于翻译思想的国际传播”即为明证。称作“观”的翻译理论在文章中提及的还有“易经翻译观”“翻译文化史观”和“建构主义翻译观”。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解释，“观”是“对事物的认识或看法”，“观念”是“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的形象（有时指表象）”，均不表示成系统的理论。或者通俗地讲，“观”是明确的主张，“观念”是潜在的意识，均不表示成系统的理论。但是否有可能作者指的就是碎片化的观念呢？非也，因为作者确实把这些被称为“观”或“观念”的理论名目归于“中国翻译理论创新探索梳理”的部分，至于为什么把“译者行为批评”称为“观念”而不是如“易经翻译观”单独使用一个“观”字，文章未作更多解释。文章出现“观念”的地方还有在陈述潘文国“文章翻译学”时所使用的“倡导文章翻译学观念”（张威 2023：66）。

“一些所谓的理论——如‘翻译行为论’（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和‘译者主体性’（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等——皆不是理论，它们只是理论概念（或者说仅停留在概念本身），不具备理论应有的体系化特征，自然就没有逻辑约束力，所以与之相关的研究往往呈现为基于事实的、‘自下而上’的充实性研究的路径。‘理论’（理论体系、理论框架）和‘理论概念’‘理论观念’‘理论观点’‘理论认识’等有着根本的不同。”（周领顺 2023f: 13）如果笔者所言不虚，张威（2023: 69）所说的“当前中国学者的翻译理论探索都处于国内阐发和应用阶段，真正为国际翻译学界了解的理论观念并不多见”之说，便是弄混了碎片化“理论观念”和体系化“理论”之间的差异，比如国际翻译学界并非不了解作为“理论观念”的“信达雅”。另外，文章提到“译者行为批评”并未明显地“吸收现代跨学科理念”，这一点也可以再议。

1.15 研究的守正和创新

译者行为批评发起了研究范式的革新。我们常说要“守正创新”，但翻译研究上的“守正”是以原文为本的翻译研究。离开原文，就失去了翻译之本，不仅使翻译实践无所依，也使翻译批评实践无所从。“守正”守的就是原文这个核心，这是底线，以原文为本的翻译研究，也称为翻译本体研究。但以原文为本的翻译研究只是一种研究范式，虽然守住了底线，却忽略了翻译活动包括翻译过程和作为翻译行为执行者的译者等一切因素所导致的复杂性，比如环境性因素和主观性因素对于整个翻译活动的影响，在开展翻译批评时如

果继续依照原文作正误判断，既显得任意，也不够全面和客观。此时，我们需要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创新”是改变思维方式，特别在“文化转向”之后，人们的视野已逐渐从翻译内部转向了外部，这种思维方式创新的好处就在于看问题更全面、客观、科学了，其直接功用体现在翻译批评上，最终落实到翻译研究范式的创新上。对于研究而言，研究范式的创新才是根本的创新，才是研究质性进步的推进力。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的译者行为研究，与其他理论视域的译者行为研究并不冲突，多元视域更有利于学术进步，这也是本研究的初衷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围绕译者行为的核心目标作多理论间的共性抽绎（比如各理论的“译者中心”）研究，打破理论壁垒，也必将成为未来译者行为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1.16 翻译理论中国学派的发展问题

译者行为批评属于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一部分。第一，中国本土翻译理论需要发展和创新，这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需要，也源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际需求。译者行为理论针对现实需求的再体系化构建，将作为中国文化内涵的一部分走向国际。第二，译者行为批评坚持“以人为本”的理论构建和研究，将有效打破理论之间的壁垒，抽绎出以译者为中心、真正为理论再体系化构建和文化译出目标所用的理论核心。第三，该理论与与时俱进，针对新的现象和问题不断开展体系化建设，不会一劳永逸，滞后于事实。第四，该理论符合去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翻译研究新趋势。

翻译理论中国学派或泛称为“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主要由三个

层次构成：

- 1) 滋养源（中国本土文化）指向。以滋养源论，中国独特的本土文化是理论构建的营养，只要是基于独特中华文化所构建的翻译理论，即使提出者是国外学者，也仍然具备中国特色，毕竟研究主体是中国学者，所以仍可大约归入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但严格地讲，根在中华却发生于中国本土之外，实为“中华翻译理论”。
- 2) 提出者（中国本土学者）指向。以提出者论，中国本土学者提出的翻译理论无疑是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如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但滋养源未必是中国本土文化，要解决的问题也未必是专门面对中国独特文化现象的。
- 3) 问题域（中国本土文化现象）指向。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不管是指向滋养源还是指向提出者，只是侧面的不同，但共同指向问题域，而回应现实关切是最大的问题域。因此，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新时代，需要在解决民族文化翻译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构建为目标所用的理论体系，而对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进行革新，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译者行为批评诞生于十几年前。当时我国并没有创建本土翻译理论的意识，更没有形成热潮，而在改革开放后，在大量引进西方翻译理论而又证明西方有关理论解释乏力后，这种意识开始觉醒。译者行为批评并非为理论而理论，是在对新的研究（解释）路径挖掘和研究范式的创新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包括译者行为批评在内的翻译理论反映了研究上的中国特色，也有助于推动打造翻译理论的中国学派。